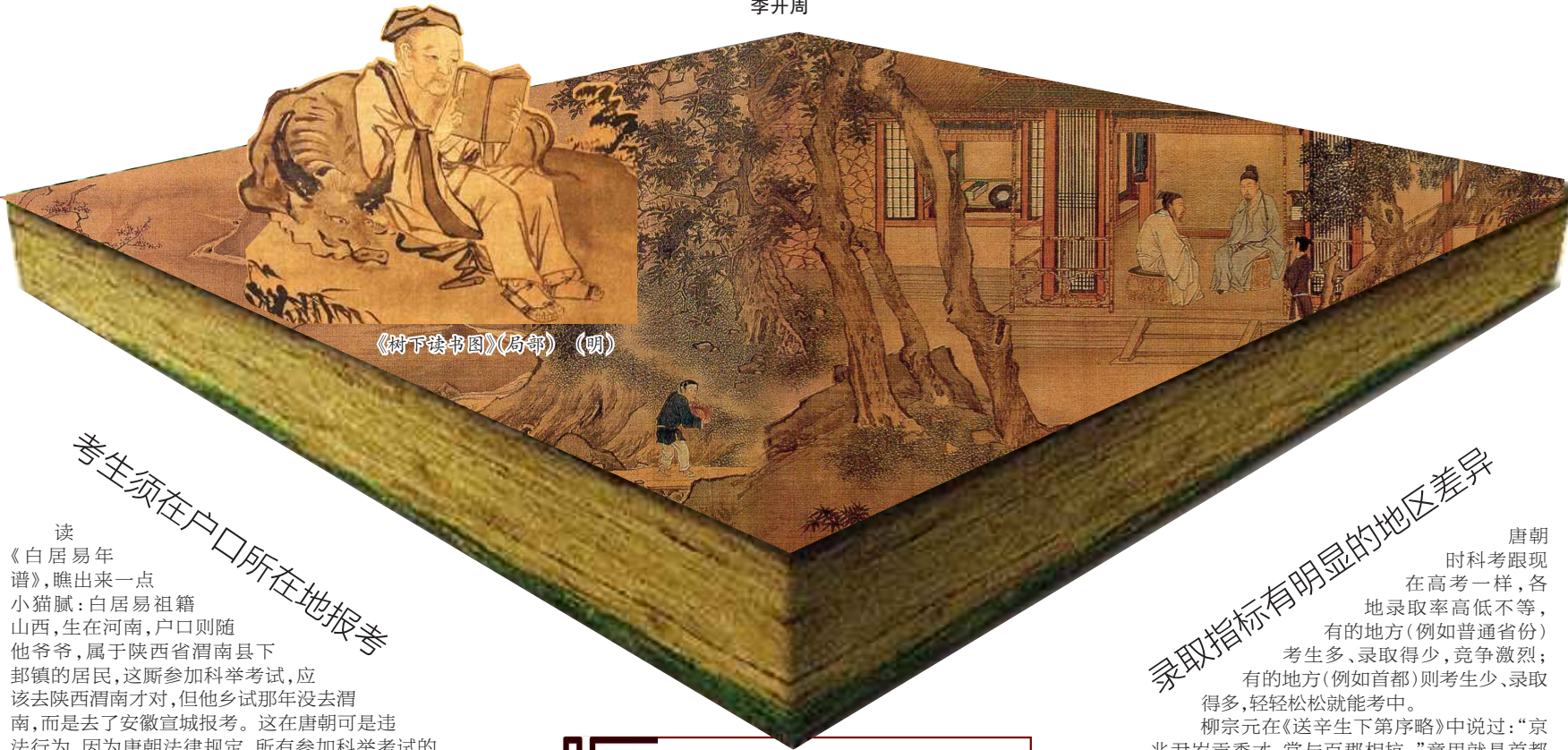


# 话说古代“高考”那些事

李开周



《树下读书图》(局部) (明)

考生须在户口所在地报考

读《白居易年谱》，瞧出来一点小猫腻：白居易祖籍山西，生在河南，户口则随他爷爷，属于陕西省渭南乡下邠镇的居民，这厮参加科举考试，应该去陕西渭南才对，但他乡试那年没去渭南，而是去了安徽宣城报考。这在唐朝可是违法行为，因为唐朝法律规定，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必须在其户口所在地报考。

白居易不傻，绝不会无缘无故以身试法，他之所以去安徽报考，一定是因为当时安徽的录取率比较高。

“高考移民”未必是真的移民，很多考生只是弄一假户口，这招儿在过去风险不小，因为古代考生必须互相做保，一个考生犯了事儿，其他考生也跟着倒霉，为了自身安全起见，大伙检举揭发的积极性都非常高，很容易把你弄假户口的事儿给捅出来。

即使你跟同学们关系铁，那监考的老师也不是吃干饭的，他们还有一道“审音”程序，就是要听听你说话的口音。“阿拉是老北京啦。”得，一张嘴就露馅儿，你分明是上海人嘛，打回原籍，取消考试资格。

除了取消考试资格，古代对办假户口的考生还有别的处罚。我翻过《日知录集释》，明朝正统十四年有一条新规定：凡“冒籍”（即填写户口不实）考生一律黜退，就近发往国子监、府学和县学充当“膳夫”。您知道，膳夫就是厨子。

为了规避上述风险，有些考生玩高考移民时不惜血本，让家长在录取率高的省份买地买房，加入当地户籍，从假移民变成了真移民。

南宋有一个考生叫章仲衡，就曾经在科举考试中玩了一出“假移民”，结果东窗事发。章仲衡是处州人，处州人考进士，考中的概率要比别处低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倒不是处州考生成绩差，而是这里考生太多、解额太少的缘故。解额是啥？就是录取指标啊。跟现在一样，古代的录取指标也有明显的地区差异，例如南宋淳熙十一年，解额最多的地方是临安府（今为杭州），给了一百人的进士指标；其次是越州府（今为绍兴），给了八十人的进士指标；再其次是福州、泉州、泰州、益州等地，每个州给了二三十人的进士指标。而章仲衡所在的处州，进士名额只有四个，考生总数则超过越州，接近临安，录取率之低可以想见。

章仲衡打听到自己有个亲戚是临安人，干脆让父亲把他过继给那家亲戚，于是他就从处州的考生变成了临安的考

生。临安是南宋首都，用我们现在的说法，首都考生的建档线要比别处考生的建档线低出一两百分，所以章仲衡就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。

中了进士，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机会，按理说章仲衡已经靠着个人努力摆脱了命运的不公，可是这人不够低调，爱显摆，回到老家开同学会，到处吹嘘自己多么有办法，还奚落那些落榜的老乡没能力。这下把大伙惹翻了，几个同学一嘀咕，把他借过继而假“移民”的事情捅到了朝廷那里。朝廷立马立案调查，很快就取消了章仲衡的进士资格。

乾隆朝就有这么两位考生，他们是哥俩，户口本来在江苏长洲，听说北京的进士好考，让父亲花100两银子在顺义县城（顺义归北京管辖）买下一所破旧小院，然后移居其中。按清朝政策，只要你在某个地方置有产业并愿意跟当地人“一体当差”（即缴税和承担劳役），政府一般都会准许你加入当地户口。所以这哥俩顺顺当当当成了北京人，顺顺当当考中了进士。

录取指标有明显的地区差异

唐朝时科考跟现在的高考一样，各地录取率高低不等，有的地方（例如普通省份）考生多、录取得少，竞争激烈；有的地方（例如首都）则考生少、录取得多，轻轻松松就能考中。

柳宗元在《送辛生下第序略》中说过：“京兆尹岁贡秀才，常与百郡相抗。”意思就是首都地区录取率非常高，一个长安城取中的人数竟然跟一个大省取中的人数差不多。

不光唐朝，两宋和明清也是这样子。北宋时江南考生多而录取少，很难考中；北方考生少而录取多，容易考中。明清时内地考生多而录取少，很难考中；边疆考生少而录取多，容易考中。

宋朝文坛大腕欧阳修曾经给皇帝写信说：“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，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，是百人取一人。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，而所解至十余人，是十人取一人。”录取率低的省份100:1，录取率高的省份10:1，地域差别如此之大，自然让考生们眼红，纷纷玩起旧版的高考移民小游戏。

## 宋朝的“高考”

在宋朝，出身于精英家庭的孩子不但在所受教育上比普通孩子有优势，而且在科举考试和公务员选拔考试当中也比普通孩子占便宜。

北宋文学家曾巩的父亲曾易占一生结过三次婚，总共生了六个儿子，即曾巩、曾晔、曾牟、曾宰、曾布、曾肇。这六个儿子当中，除了长子曾晔，另外五个都考中了进士。最令人惊奇的是曾巩考中进士那一次，他带着弟弟曾牟、曾布和堂弟曾阜，以及妹夫王几和王无咎，六个人同时参加由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，居然一个不拉全考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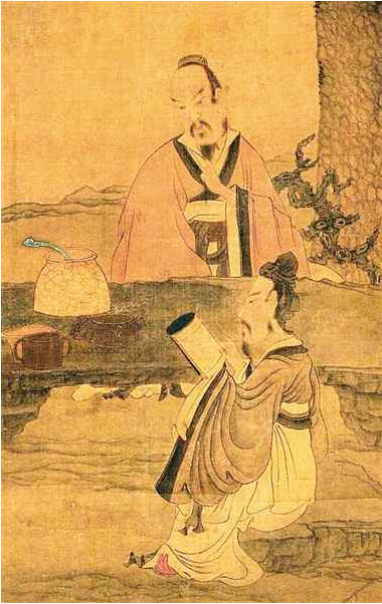
宋朝科举考试并不容易通过，据北宋大臣上官均《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》一文描述：“今科举之士虽以文章为业，而所习皆治民之说，选于十数万之中而取其三二百，使之治民，理或可也。”从地方科考到中央科考，从州试、省试再到殿试，平均每次有十几万名考生参加，而最终被取中的只有二三百名而已。录取率如此之低，考生们除了要拼成绩，更要拼运气，像曾巩等六人同时入场，同时考中，这种奇迹从概率上是很难解释的。

宋代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，并不代表可以做官，还需要再参加一场“关试”。在后面这场考试中，制度上的不公平简直是显而易见的：每名考生都要先获得两名以上在职官员的保举，然后才能进场。前面说过，曾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“高干”，他们家跟王安石又有亲戚关系，并且曾巩又从小受到欧阳修的赏识，有了如此强大的官场人脉，别说获得两名官员保举，就算要几十个保举都没问题（笔者注：王安石的年龄比曾巩小，但是却比曾巩做官早得多，所以曾巩是有可能获得王安石保举的）。而那些出身于平民家庭的考生就困难多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宋朝的科举考试或许只是在事实上不公平，而宋朝的公务员考试则从制度设计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。

《秋窗读易图》(局部) (宋)



《松下读书图》(局部) (明)



《雪窗读书图》(局部) (宋)



《小青小影图》(局部) (清)

